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研究 ——以北京市为个案

张浩 著



人民出版社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研究 ——以北京市为个案

张浩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余 平

封面设计:马淑玲

责任校对:孟 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研究:以北京市为个案/张浩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6

ISBN 978-7-01-013605-9

I. ①新…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共产党-城市管理-历史-研究-现代
IV. ①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3142 号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研究
XINZHONGGUO CHENGLI CHUQI ZHONGGUO GONGCHANDANG CHENGSHI GONGZUO YANJIU
——以北京市为个案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

字数:360 千字

ISBN 978-7-01-013605-9 定价:4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由城市转移到反革命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并逐步地将工作重心放在农村,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但是,农村只是中国革命的战略出发地,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夺取和占领城市。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夺取和接管城市是中国革命道路通向最后胜利的关键阶段,是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历史阶段,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进入了以城市为中心,由城市领导农村,实行城乡兼顾、工农兼顾,并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的新时期。

城市是一个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是较多地体现先进生产力状况的地方,占领一座城市并做好这个城市的工作,就可以依靠城市来领导和影响其周围的农村,带动农村的发展,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城市是工人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做好城市工作,党就可以密切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并且巩固和扩大同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城市一般是工商业集中的地方,做好城市工作,不仅能为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一定的物质基础,而且有利于新生人民共和国内政权的巩固。因此,城市工作是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了做好城市工作是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首要任务,要求党和军队“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城市工作十分重要,同时又是相当复杂的。城市的政权形式、阶级结构、经济成分、生产方式、社会矛盾、文化形态、对外交往等,都与农村截然不同。在农村,主要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城市,不仅有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更有广大城市人民同官僚资产阶级、国民党残

余势力、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农村,农业是主要的生产事业;在城市,不仅有工业,而且有商业、金融、对外贸易等各项事业。因此,做好城市工作,比做好农村工作要困难得多。面对这一复杂的历史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城市的具体情况,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城市工作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不仅成功地接管了城市,而且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改造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城市,从而大大地改变了城市的面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张浩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研究》一书,就是他在自己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潜心再研究而完成的专著。

我认为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文献史料较为丰富。中共党史著作的撰写一定要从确凿的史料,特别是一手史料出发,用事实说话。该书作者不仅较充分地运用了已由中央档案馆和北京档案馆整理出版的档案史料,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等,而且还到北京市档案馆和北京市各区档案馆细致地查阅和收集到了许多原始的档案史料,这为该书的撰写奠定了扎实的史料基础。同时,该书作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大量史料进行了整理、鉴别和恰当的取舍运用,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系统梳理,论述客观准确。仅此而言,该书具有重要的档案资料价值。

第二,理论视角比较新。该书作者是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为分析框架来对选题进行研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审慎思考后所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它正确地回答了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如何避免资本主义前途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以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为分析框架,该书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城市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改造方面的工作。这既为研究党的城市工作提供了一个比较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深入研究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实践素材。

第三,研究方法有一定的新意。该书作者把宏观分析方法与微观分析方法相结合,采取“解剖麻雀”的个案研究范式,以北(平)京市为案例,在兼顾宏观与微观的中观视野下,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北(平)京的各项城市工作以及城市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对党的城市政策的实践与反映,立体地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生动历史画面,并切实通过研究党在北(平)京市的政策,揭示了党的整个城市工作的内在联系和普遍规律。该书虽然以个案为主,但又有整体研究的升华。其中特别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城市工作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深入阐述;对这一时期党的城市工作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提炼;准确地把握了宏观与微观、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共性与个性的互动关系。

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不仅有助从一个重要方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也有益于对今天的城市治理提供一定的借鉴。在新中国即将成立 65 周年之时,该书的出版也很有纪念意义。

特向作者致以衷心的祝贺并向读者诚挚地推荐该书。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全 华

2014 年 5 月 28 日

前 言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此后 20 多年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在农村。但毛泽东早就说过:“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①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制定正确的城市政策,开展有效的城市工作,已经突出地提到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1949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②但是,能否接管和建设好城市,是党面临的新的严峻考验。北平、天津等大城市解放时,中外反动派预言中国共产党不可能管理好城市,等待着中共的是失败的结局。人民解放军进城后不久,一些资本家和投机商曾公开宣称:共产党搞军事是一百分,搞政治可得八十分,而搞经济则只能打零分。面对这一挑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曾形象地把进京比作赶考,提出不学李自成,要考个好成绩。北平和平解放后,党对这一城市进行了成功接收,并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改造等方面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成功地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改造成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城市,使这些城市的前途和命运发生了根本转变。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研究意义

首先,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有助于从一个重要方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36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27 页。

面推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正如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会议筹备会上所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①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端阶段,研究新中国的历史需以此为起点,研究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需追溯到这一时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也必须总结这一时期的成败得失。因此,研究该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有助于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其次,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有助于从一个重要方面推进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并不是从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从党史看,1921年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城市里诞生的。中共成立后,曾制定过许多城市政策,做过许多城市工作,领导过城市的政治运动和武装斗争,推动了大革命的发展。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武装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第一枪也是在南昌这个大城市里打响的。在随后的一个长时期里,党的工作重心在农村。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强调“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②。此后,党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城市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因此,加强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研究,有助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

再次,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有助于总结其在城市的执政经验与教训,从一个重要方面推进对党的建设的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使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地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而且也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共从战争时期开始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由被压迫、被“围剿”、被屠杀的革命党变为公开的、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能否成功接收、管理与建设城市,是中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面临的重大考验。当时,帝国主义者曾嘲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是山沟里出来的,管理不了大城市,解决不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吃饭问题,预言共产党会在大城市的泥潭中沉沦淹没^①。但是,他们的预言落空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对城市进行了成功的接收和有效的管理,而且积极推动城市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把消费的城市变成了生产的城市,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体现了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在全国范围执政的起始阶段,但是,党在自身建设特别是在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是颇有建树的,这对当前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执政能力建设仍有启示作用。因此,研究该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有助于推进对党的建设的研究。

又次,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有助于从一个重要方面推进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研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革命后所要建立的社会制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而提出来的系统理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已经开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多方面展开、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更为广阔的实践条件。城市成为各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带动和领导农村的战略基地,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因而,研究中国共产党关于城市工作的理论,有助于从一个方面推进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研究。

最后,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可以为今天中国共产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提供重要的借鉴。城市是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心,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②。如何加强对城市的管理与建设,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毛泽东曾

① 《当代中国的北京》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② 《人民日报》1999年11月29日。

经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的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①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城市工作理论与实践,也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以利于把我们现在的城市管理和建设搞得更好。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情况看,解放前,城市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城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及其他社会方面的矛盾极端尖锐;人口问题、环境问题、暴力问题和社会风气问题等社会问题非常突出;贩毒卖淫,匪特猖獗,乞丐成群,城市社会秩序异常混乱。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建设人民的城市为出发点,坚持人民的城市由人民管理和建设的基本观点,城市人民政权得以较快地建立并逐步巩固;把发展生产事业作为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把变消费的城市为生产的城市作为城市工作的目标,把为生产服务、为人民服务作为城市建设的原则,制定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城市经济政策,从而使通货膨胀迅速得到控制并有效地稳定了物价,城市生产也得以较快地恢复和发展;把工人阶级作为城市工作的依靠力量,并注意团结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利用一切可用的社会现成的人才,调动城市一切积极因素管理和改造城市,使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努力解决有助于恢复秩序和稳定人心的城市生产、生活问题,通过新民主主义道路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工作中所积累的许多重要理念和做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它们至今仍有生命力。这些正确的理念和成功的做法,为今天中国共产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从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来看,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城市工作进行研究的专著,主要有刘宋斌的《中国共产党对大城市的接管(1945—1952)》、李玉荣的《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的理论与实践》、李国芳的《初进大城市——中共在石家庄建政与管理的尝试(1947—1949)》和郭圣莉的《国家政权建设与城市社会重构——建国初期上海国家政权建设分析》。以上四本专著,前三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9页。

本是从中共党史视角通过史料梳理对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进行的历史考察和经验总结。后一本则以上海市为研究个案,以国家政权建设视角分析了新中国国家政权如何在一个异质性程度极高的城市空间形成、发展并构建与自身相适应的社会基础。该书提出上海旧慈善团体、同乡会等民间性社会团体转变为隶属于国家的人民团体,使原有的行政与社会双重管理体系转变为单一的行政的管理体系。而在里弄空间从保甲到居委会的建立过程中,新中国通过“阶级净化机制”,在社会中不仅构造了城市社会基层组织——居委会,而且彻底改造了里弄空间。

国内相关的研究论文则比较多。其中,关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党的城市工作、党的城市经济工作特别是城市私营工商业方面的工作是研究的重点,如《全国解放战争后期党的新区城市政策与城市工作述论》^①、《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城市经济工作》^②、《“四面八方”政策与建国前后城市经济的恢复与发展》^③、《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城市经济政策》^④、《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城市私营工商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⑤;也有研究者通过研究中共党史人物来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这方面的成果有《毛泽东和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⑥、《毛泽东与建国前后的城市工作》^⑦、《论毛泽东解放战争时期对党接管城市工作的贡献》^⑧、《建国前夕刘少奇对经济建设和城市工作理论与

① 沙健孙:《全国解放战争后期党的新区城市政策和城市工作述论》,《党的文献》2000年第1期。

② 张春英:《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城市经济工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③ 黄小同:《“四面八方”政策与建国前后城市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④ 赵增延:《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城市经济政策》,《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⑤ 杨青:《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城市私营工商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党的文献》2005年第1期。

⑥ 王琉钟:《毛泽东和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6期。

⑦ 杜玉芳:《毛泽东与建国前后的城市工作》,《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⑧ 王金艳:《论毛泽东解放战争时期对党接管城市工作的贡献》,《理论学刊》2006年第7期。

实践的探索》^①、《刘少奇建国前夕关于城市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考析》^②、《建国前后刘少奇的城市工作思想及意义》^③、《刘少奇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④、《建国前后陈云关于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理论与实践》^⑤、《陈云对解放战争时期接管城市工作的贡献》^⑥、《张闻天对城市工作的贡献》^⑦、《王稼祥与党的城市政策》^⑧、《叶剑英在广州城市管理中的理论建树(1949—1952)》^⑨;把具体城市作为个案来分析党的城市工作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趋势,这方面的成果有《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⑩、《从〈邯郸市政府施政方针〉的颁布实施看党的早期城市政策》^⑪、《党的城市接管政策的成功运用——以潍坊市为个案的历史考察》^⑫、《试述南京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⑬、《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以上海“镇反”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⑭;此外,还有研究者对西方某些研究建国初

① 梁桂珍:《建国前夕刘少奇对经济建设和城市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

② 董一冰:《刘少奇建国前夕关于城市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考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年第3期。

③ 殷丽萍:《建国前后刘少奇的城市工作思想及意义》,《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年第9期。

④ 薛承:《刘少奇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6期。

⑤ 高中伟:《建国前后陈云关于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毛泽东思想研究》2007年第1期。

⑥ 王金艳:《陈云对解放战争时期接管城市工作的贡献》,《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6期。

⑦ 施松寒:《张闻天对城市工作的贡献》,《人文杂志》1990年第6期。

⑧ 徐则浩:《王稼祥与党的城市政策》,《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

⑨ 莫岳云:《叶剑英在广州城市管理中的理论建树(1949—1952)》,《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⑩ 张济顺:《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⑪ 王昌兰、谷志强:《从〈邯郸市政府施政方针〉的颁布实施看党的早期城市政策》,《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

⑫ 管延春、麻福水:《党的城市接管政策的成功运用——以潍坊市接管为个案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2期。

⑬ 付启元、卢立菊:《试述南京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⑭ 杨奎松:《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以上海“镇反”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9期。

期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著作中所使用的不准确的史料进行了订正,对其中不恰当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如《建国初期城市政策的几个问题——为〈剑桥中国史〉订正史实》^①、《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有力措施——对〈剑桥中国史〉第二章有关部分的评析》^②。此外,还有一些高校的博士生把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作为毕业论文选题,如:吉林大学王金艳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上海大学黄亦君的《中共对贵阳的接管与政权建设(1949—1952)》、首都师范大学黄利新的《共和国初期北京市城区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首都师范大学刘胜男的《北京城市手工业研究(1949—1966)》、中共中央党校廖胜平的《北京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3)》等。

国外学者也对该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早在1950年,美国学者史坦纳(H.Arthur Steiner)就在《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③一文中着重对中国共产党从农村到城市的战略转移,城市的军事接管经验特别是长春的接管经验,军事管制委员会组成和运作,城市政府的治理模式,公共事务机构对旧人员的留用和处理,以及新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这是西方学者较早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文章。

196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傅高义(Ezra F.Vogel)的著作《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④。傅高义以广州为研究个案,对1949年至1968年间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着重探讨了共产党人是如何建构起足以控制和变革社会的庞大政治体系的。他认为,作为中国大陆最后一个被解放的大城市,中国共产党在接管广州后,通过本地干部和南下干部的团结和合作,以及新干部的录用和训练,增强了广州共产党组织自身的力量;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巩固了政权和消灭了可

① 孙瑞鸾:《建国初期城市政策的几个问题——为〈剑桥中国史〉订正史实》,《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5期。

② 戴鹿鸣:《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有力措施——对〈剑桥中国史〉第二章有关部分的评析》,《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

③ H.Arthur Steiner, *Chinese communist urban poli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0.

④ Ezra F.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1949—19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69.

能的反对势力;通过抗美援朝运动和基督教“三自运动”^①,以及通过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加强管制等,逐步排斥和清除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广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对于私立学校和私立工商业,虽然没有像对官办学校和官僚企业一样接管,但通过多种途径加强了对它们的限制和控制;通过“三反”、“五反”运动等各种措施整顿了金融,稳定了物价;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则按照新社会的要求重塑了知识分子思维模式,不仅使知识分子的直接反抗销声匿迹,而且使新政权获得了他们的一定支持。

1980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的著作《天津的革命与传统,1949—1952》^②。李侃如认为,共产党的国家权力在向城市传统社会渗透时,为了不影响到城市经济的恢复,限制了对社会干预和社会控制的力度和节奏。因此,对于城市中绝大多数人来说,直到“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随着共产党所领导的群众组织的发展和它们影响力的扩大,它才真正成为改造他们生活的革命力量。虽然,革命后社会形成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以替代传统的“关系”,共产党的宣传也不断批判传统的“关系”,但传统的“关系”网络一直都保持强有力的生命力。由于政治运动造成权威的失落,传统的私人关系反而成了人们的依托。革命后城市中传统的方面并没有消失,传统的因素和现代的因素始终共存着。

2004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旅美华人高崢(James Z.Gao)教授的著作《共产党接管杭州:城市和干部的转型(1949—1954)》^③。高崢认为,当从山东农村来的南下干部被派往杭州市以建立对这个城市的控制时,南下的农村干部和杭州市民相互接触。在文化的对峙与融合中,南下的干部和市民相互渗透到彼此的阶层里,最终,双方都具有双重的特性。共产党在城市工作中的成功主要在于建立诸如会议这样一些新的政治仪式,并围绕这些仪式建设新的社会主义城市文化,把文化作为重要武器去巩固新的政权。通过不断的政治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国家主导的宣传等,使这些仪式具有神秘一

① “三自运动”,即自治、自养、自传运动。

② Kenneth Lieberthal, *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 1949—1952*,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80.

③ James Z.Gao,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面,南下干部也正是运用这些仪式,将更激进的变化带到城市生活中。同时,高崢还提出,人民共和国早期实行的相对谨慎的城市管理方针,并不是对激进主义的妥协,而实际上是为革命热潮的到来提供铺垫与准备。

同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举行了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重新审视 1949—1953 年的变迁时期”的学术会议,哈佛大学出版社于 2007 年把参与这次会议的论文结集出版,书名为《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该论文集分“城市接管”、“外围占领”、“文化调适”和“家族策略”四个专题,共 15 篇论文。其中第一个专题“城市接管”三篇论文包括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的《“清洗”:上海的新秩序》、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的《国家的主人? 上海工人在早年的人民共和国》和 Nara Dillon 的《新民主主义与上海私营慈善机构的让位》,均是以上海市为研究个案,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上海市的接管情况。

纵观国内外学术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国外研究和国内研究的不同特点。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很看重建构研究模式和分析框架。这种所谓的研究模式和分析框架是一种假设的、建立在规范认识基础上的认识结构,如“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分析框架、“精英主义(Elitism)”的分析框架、“国家政权建设(state—building)”的分析框架、“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分析框架等。这些框架对分析和认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的运行机制具有一定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意义。但由西方学者建构这些分析框架往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特别是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如“全能主义”本是西方学者分析法西斯体制和苏联共产主义体制的概念,西方学者把这个概念从对苏联的研究中拿来运用到对中国的研究中,不免深深打上了冷战思维的烙印。而西方最常用的“现代化”分析框架,其核心理念是“西方中心主义”,用来分析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也并非就是科学和准确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西方学者由于掌握的资料、信息不够全面,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了解不够或很不够,因此在史料的运用上也常存在失实不准以至于导致错误结论的现象。不过,他们的研究仍有许多可借鉴之处。西方学者强调学术方法的多样性,通过运用数量分析方法、比较史学方法、口述史学方法以及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展示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城市政策的多重面相。而且,西方学

术界对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的研究,多以某个城市为个案进行微观分析,这些个案研究往往能够以小见大,见微知著,通过微观和细节的考察生动地展示历史的脉动。

国内的研究则大多是对历史进行钩沉,注重对历史事实的建构和解读。与西方学者相比,国内学者在史料的丰富性和准确性上更具有优势,但存在理论分析不足和研究方法单一的情况。目前,也有学者从西方学术界引进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运用到对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研究中,如郭圣莉的《城市社会重构与国家政权建设——建国初期上海国家政权建设分析》就借用了西方学术界常用的“国家政权建设(state—building)”的分析框架。西方学术方法和理论模式的引入,大大扩展了国内学术界的研究视野,但如何使西方学术方法和理论模式本土化,并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仍需国内学术界的努力。

三、研究方法

本书从第一手历史文献资料出发,遵循辩证唯物史观的指导,力求做到以下“四个结合”。

首先,坚持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研究相结合。宏观的历史叙述着眼于历史大视野的描述,有助于人们对历史发展主线的全面认识和历史图景的整体把握,但不免空泛与单薄。而微观实证研究对历史的阐述较为深刻与生动,更有厚重的历史感,往往可以达到以小见大的效果,但如果只顾考察个案或局部,而不顾更广阔的历史语境,则很容易陷入碎化研究的窠臼。本书的研究将努力把宏观分析的方法与微观分析的方法结合起来,既关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城市政策,又着重分析北京市是如何认识和贯彻党中央的城市政策,注重分析北京市具有地方特色的政策创新,而且还关注城市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对党的城市政策的实践与反映。这样,本书通过科学的把握宏观与微观、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共性与个性的互动关系,在兼顾宏观与微观的中观视野下,力图通过研究党在北京市的政策来揭示党的整个城市工作的内在联系和普遍规律。这样,就能既不丧失广阔的历史与政治语境的眼光,又能检验概括化的程度,还原被宏大叙事遮蔽的社会真貌,窥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复杂和凝重。

其次,坚持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研究相结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就是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剥除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表面现象,揭示其本质规定性,从而把握历史发展的真谛。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顺序与逻辑顺序的一致性,并认为在研究历史时要注重逻辑推演与哲学思辨,力求从理论高度审视与反观历史,以避免陷入纯史料的迷茫之中。在本书的研究中,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既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与叙述,又注重现代逻辑分析方法的巨大作用,力图把史料中带有共性的对象的联系和特征分离开来,把史料所隐含的社会历史信息显现出来,通过重构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市开展各项工作的历史,剖析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所体现的革命与建设的双重逻辑主线。

再次,坚持纵向比较研究与横向比较研究相结合。纵向比较可以深刻认识事物随时间的推移发生的变化及其兴衰更替的内在机制,从而追溯事物发展的历史渊源,明了事物发展的顺序,推测事物发展的方向。横向比较通过探求事物的横向联系,揭示事物的共同本质和规律,由此达彼地得出新的认识结论,扩大研究范围,得出更普通的结论。本书将坚持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研究。一方面,注重对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段时间的演变分析,同时也关注这一时期党的城市工作与该段时期之前和之后的城市工作的比较分析,以了解党的城市工作的来龙与去脉。另一方面,在以北京市为个案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的同时,也考察党在其他城市开展各方面工作的情况,以比较党在不同城市所做工作的异同。通过这样的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研究,将对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有个多维、立体的把握。

最后,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有助于确定事物的性质,定量分析则有助于更全面、更精确、更深刻地认识事物。如果缺少大量的数量研究做基础,仅仅依靠定性研究,史学研究难以实现科学化。而定量研究也必须升华到定性研究,否则无助于对历史规律的探究。马克思主义质量互变规律告诉我们,在对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进行历史考察时,必须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如对党的城市经济工作的研究,定性分析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私人资本主义政策的新民主主义性质,而定量分析城市若干经济发展指标则可以使我们对党的城市经济工作取得的成就一目了然。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两种方法的相互作用、相互借